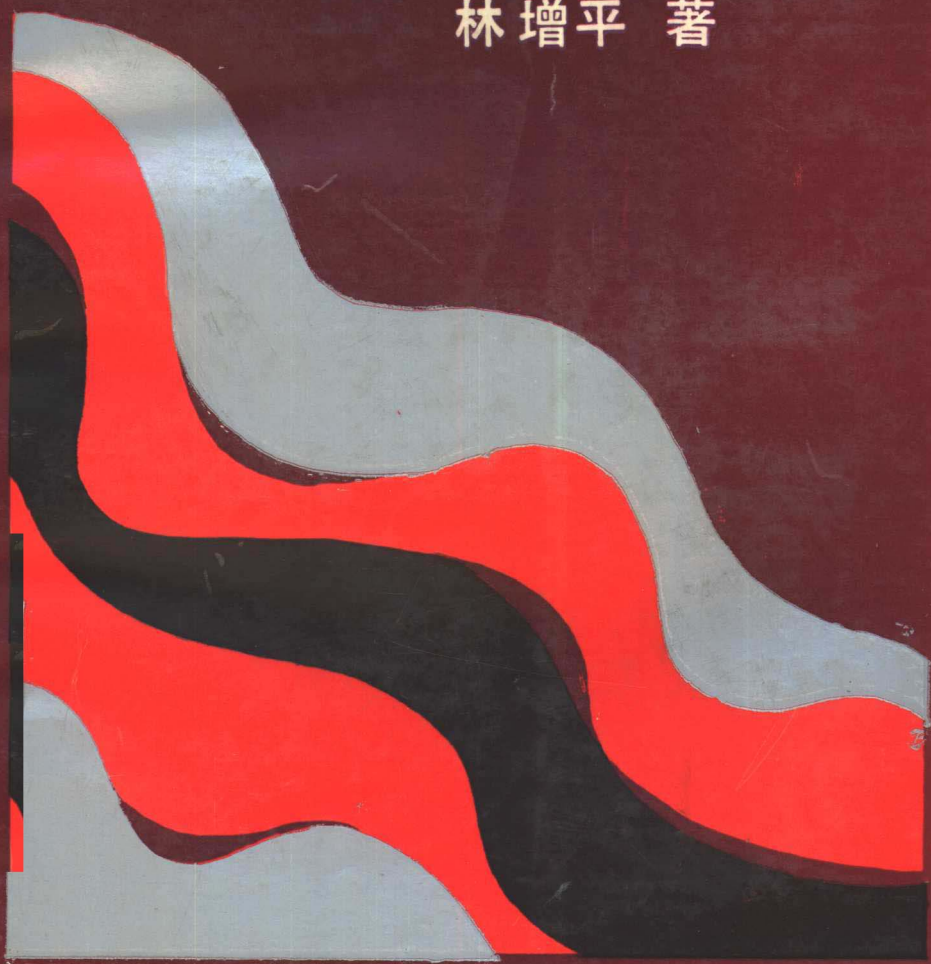


资产阶级与 辛亥革命

林增平 著



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

林 增 平 著

湖南出版社

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

林增平 著

责任编辑：邓代蓉

*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199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125 插页：2

字数：327,000 印数：1—1950

ISBN7—5438—0169—8

K·25 定 价：5.50元

目 录

辛亥革命史研究琐谈（代序）	（1）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	（22）
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刍论之一	（26）
洋务派——早期官僚资产阶级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刍论之二	（35）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于何时？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刍论之三	（43）
太平天国革命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	
索	（54）
谈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洋务运动	（64）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	（72）
略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与清末立宪派	（115）
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	（137）
革命派、改良派的离合与清末民初政局	（162）
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保路运动	（184）
辛亥革命时期天地会的性质问题	（224）
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会党和农民	（238）

会党与辛亥革命·····	(250)
民国初年宗社党掀谈·····	(258)
试论民国初期的议会政治·····	(265)
孙中山早期思想研究述评·····	(282)
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	(295)
邹容和陈天华——中国近代两位卓越的民主革命宣传家 ·····	(317)
宋教仁，为民主宪政而献身的杰出革命家·····	(336)
黎元洪与武昌首义·····	(353)
试论熊希龄·····	(365)
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民主革命·····	(383)
“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赞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	(392)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前言·····	(400)
介绍《石叟牌词》·····	(406)
《黄兴年谱》读后·····	(412)
《廖仲恺和何香凝》读后·····	(415)
后 记·····	(417)

辛亥革命史研究琐谈

（代序）

—

我于1951年起在前南昌大学担任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工作。1953年夏，中南地区进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我调到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仍操旧业，几乎是每学年都周而复始地从鸦片战争讲到五四运动。每一次轮回，我都将讲义从头到尾修改一遍。那时三十刚过，还算是年富力强，而且也不象1957年以后那样没完没了地搞运动，“白专道路”这顶“帽子”，似乎还不曾“应市”。所以，一头栽进业务里，倒也不虞有“白专”之嫌。1957年，这份讲义五易其稿，在翌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用《中国近代史》的书名，分上、下册出版。可也说得是适逢其会，难得有个自己伸长脖子的“出头鸟”，书刚一问世，立即在“拔白旗”运动中招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围剿”。批过不久，几个学生悄悄地告诉我，北京出版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一篇书评，向读者推荐这两册书。我当然不免有点私心窃喜，但也颇为担忧，害怕因此惹起更令人困惑的“对着干”（“四人帮”发明的这个词，借用来说明我的忧虑，似也恰当）。经此一“拔”，两册《中国近代史》就只有“覆酒甌”的用场。十年“文革”中被指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更属是意料中的事了。

“四人帮”的被粉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政方针，把一切工作，包括社会科学的研究，引上了稳步发展，日趋

繁荣的境地。我的那两册《中国近代史》，也似乎是又适逢其会，从1979—1984年重印三次，发行超过十一万册。可我心里完全明白，这并不是区区两册书写得好，而是正值拨乱反正不久，史学界还没来得及写出新的、足够份量的近代史著作，故而那老本本还有点“承乏”的作用。然使我深感不安的是，由于抽不出时间来增删校订，以致三次重印我都不曾对书中存在的论述不当、史事讹误加以修正；而史学界同人和广大读者竟对此书的瑕疵抱如此宽谅的态度，的确使人感动，受到鼓励。

60年代初，我感到中国近代史虽只八十年，但却是一个内外交迫、新旧杂陈、变化万千的时代，以个人有生之年，似乎难以做到博识精通，因而决计收缩战线，确定专攻辛亥革命史。1960年，我应中华书局约，撰写一本《辛亥革命》小册子，编入“知识丛书”。次年，有幸参加在武汉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得识史学界前辈吴玉章、范文澜和不少同行先达，很受教益，觉得辛亥革命史里边有不少课题值得问津，于是，主攻方向就确定下来。

二

由于钻研辛亥革命史，劈头就碰到中国资产阶级的课题。1964年，我重读《共产党宣言》，发现其中关于西欧资产阶级来源的叙述，和我们对中国资产阶级前身的理解，迥然不同：在西欧，“中世纪的城关市民等级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出身。”（《共产党宣言》）；在中国，“一部分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出身。”（《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我把西欧和中国资产阶级出身的不同加以比较，从而说明两者性格上的差别，藉以探讨中国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我就此写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

发表于 1965年8月20日《人民日报》。自认为，这可能是找到了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的突破口。正当我兴致勃勃地朝这个方向探索时，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研究工作停顿了十年。

“四人帮”垮台不久，1976年11月，章元沅同志倡头编写《辛亥革命史》的编委会在长沙开会，讨论编写指导思想和体例诸问题。大约是因为经受了十年“文革”的濡染，人们脑子里总充塞着一些似乎不容置疑的观念：资产阶级是应批倒批臭的，现在却专门为中国资产阶级写一部革命史，行吗？大伙不能不深切感到，尽快清除“文革”中弥漫天下的那些极“左”的，以及荒唐透顶的谬论，正确说明中国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的关系及其历史地位，确属必要。因此，我又重新拾掇起“文革”前刚开头的课题，继续进行研究。以下简要说明迄今我对这一课题的粗浅见解。

我认为：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时代的城市与西欧中世纪中期兴起的城市存在很大差别，因而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没有产生过象西欧那样的市民等级。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外国商货的加速输入，在华洋商投资开设的船坞和各类加工工业的陆续出现于通商口岸，从而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客观条件。于是，一部分的地主、官僚和商人，就充当了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然而，在早期，并非任何积聚了钱财的地主、官僚和商人都能够转化成资产阶级，只是为数不多的、有权势、且同外国资本主义有联系的那一部分官僚和买办，才具备转化的可能。基于此，在19世纪60年代，即产生了一种标榜“借法自强”的洋务舆论，首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开始引进若干制造枪械弹药的设备，创办新式军事工业。70年代后，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相继败灭，洋务活动遂转向兴办航运、煤矿、纺织等民用企业，资金则主要来自买办商人。但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固，如同当时人郑观应说的：“军商务之战，既应

藉官力为护持，而工艺之兴，尤必藉官权为振作。”（《盛世危言·商战》）所以，那时的新式企业，也就以官办、官督商办的方式来经营管理，从而导致把持或实际占有这些企业的人们成为中国早期官僚资产阶级。到19世纪80年代，官办、官僚商办体制的弊害日益显露，商办企业渐次兴起，于是，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就从投资、经营这类企业的人们里渐次产生。一部分的地主、官僚和商人（买办），大体上是分别沿着这样两条渠道，缓慢地孳长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两大部类——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当然，还有少量的小生产者上升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之间也有互相转化的，这里只是指主要的发展渠道）。

终19世纪之世，中国民族资本家为数尚少，它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转入20世纪初，随着国内商品经济的渐次扩大，以收回利权为主旨的爱国运动的勃兴，以及清政府于1901年颁诏推行新政，商办企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其资本总额显著地超过了官办、官督商办企业的资本总额。民族资本家集团遂因其数量的大增，经济实力和社会活动能量的扩展而开始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并渐次分化为上层和中下层两个阶层。

在学术界曾经有一种看法，即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是由一部分地主、官僚、官商转化而来，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及其政权有密切联系的资本家集结而成的；其中下层，则是指民间普通手工业者和商人上升，经济力量较薄弱，同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联系较少，而所受压迫又较大的那一部分资本家。我觉这种看法似可商榷。因为如同前面谈到，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并没有象西方中世纪后期那样产生市民等级；鸦片战争后，除封建势力外，还有外国殖民主义严重地堵塞和困厄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因而除开一部分的地主、官僚和商人（买办）获得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可能外，民间普通手工业者和商人则因力绌势微，得

以上升为资本家者，数量确属不多。他们事实上不可能构成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而据我襄助章开沅编撰《辛亥革命史》时所作的粗显考察，觉得“由具有一般士绅地位的在籍官僚、候选候补官僚和地主转化而来的，在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里仍占较大比例”，“买办转化的为数（也）不少”。因此，按资本家转化的来源不同作为划分上层、中下层的准绳，与事实似有出入。其次，将“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及其政权有密切的联系”作为上层的属性之一，也不能不令人有所疑惑。因为，如果上层具有这种属性，那他们同买办资产阶级就没有区别了。

然则，究竟应当怎样区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下层呢？我认为，他们之间的区分，不取决于各自以何种社会身分转化为资本家，而取决于各自在转化过程中能否倚仗封建性的权势获得扩大雇佣剥削积累的便利。一些本来就有较高的封建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资本家，因从清政府推行的所谓“通商惠工”的新政里揽到某些权益，从而能较顺利、较多地扩大其雇佣剥削积累的人们，大体上可称作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另一些获得封建性权益较少，而较多地受到封建制度和清王朝的阻厄和损害，积聚资本较为艰困的人们，则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就数量而言，中下层人数较上层为多，因为，中下层内有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资本家和集资合股经营机械化程度不高的工矿企业的资本家。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有共同的政治要求和经济利益，即希望废除或尽可能减少封建专制主义的剥削，实行政治民主，以便顺利地发展资本主义，增殖利润。两者之间又有矛盾和分歧：上层主要是倚仗若干封建性的权益而获得扩大资本积累的便利，故不愿意清王朝被推翻，只期待它实心改革，推行君主立宪；而推翻清王朝，尽可能地清除封建主义制度，则更符合中下层的长远利益。基于此，在政治上就产生了资产阶级立宪派和革命派。辛亥革命时期的重大事变，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同革命派、立宪派

的离合消长的变化相联系。

三

较长期间，学术界一般将立宪派作为一种纯属抗拒革命，一无是处的消极力量看待，这是不公允的。我于1980—1981年就立宪派的功过发表了《略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与立宪派》（《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二辑）和《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人民日报》1981年10月5日）两篇文章，主要论点是：立宪派人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而这个上层则主要倚仗所获得的若干封建性的权益以扩大雇佣剥削的积累，所以他们不愿意清王朝被推翻，只是要求统治集团着实仿行宪政，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使本阶层的代表参与议政，藉以保障自身的利益。为此，立宪派多次发动国会请愿运动，致力于兴学育才和推广科学技术，更倡首参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保路保矿运动。这些，都产生了冲击封建专制主义，扩大资产阶级民主观念和文化思想传播的作用。在这方面，立宪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他们抵制革命的罪过，也不能因此就一笔勾销。

按照梁启超制订的立宪派人的策略是：“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73页），所以，立宪派与革命派很长期间处于对立状态。到了1910年冬，由于清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推行其虚假漫长的“预备立宪”，拒绝并镇压立宪派人的国会请愿；次年春夏，又推出了集权满族亲贵的“皇族内阁”，且颁布“铁道干路国有”政策，随即悍然劫夺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攸关的川汉、粤汉铁路，这就大大地激怒了立宪派，并严重地损害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无异是把立宪派推向了革命派的一边，促使两派弃嫌修好。于是，在武昌首义后掀起的反清高潮中，两派的人们遂

在各省实行了方式不同的联合，把清王朝驱入极其孤立的地步，使它迅即被全国人民所推翻。

在论述革命派、立宪派有过一度从对立到联合的经历后，我发现，民国初年，革命派同原立宪派人（主要是进步党）又有过再度分裂和联合的迹象，竟对当时的政府产生决定性的作用。为此，我又写了一篇题为《革命派、改良派的离合与清末民初政局》（《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提出这两派从清末至民初经历了明显的“对立——联合——分裂——再联合——再分裂”的看法，发现这两派的两度联合，遂导致了辛亥起义和护国运动的胜利；而两度分裂，则不能不认为是二次革命失败和护法运动鲜著成效，徒使南北军阀坐大的主要原因。这一系列史实表明，从19世纪末至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跃登政治舞台，纵横捭阖，引导历史潮流前进的年代。分别代表这个阶级上层和中下层的两大政治派别——改良派和革命派，经历了“对立——联合——分裂——再联合——再分裂”的过程。掌握两者离合轨迹，就不难探寻到清末民初政潮起伏与民族资产阶级势力消长的内在联系，并可藉以理解这个阶级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历程中成败利钝的因果和是非。

然而，学术界又有一种看法，觉得把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上层和中下层，缺乏足够的依据；即使存在这种差别，也与他们各自的政治态度没有必然的联系：上层支持革命者颇不乏人，中下层反对革命者更非罕见。因而认为，立宪派未必是上层的政治代表，革命派未必仅代表中下层的利益。为回答这类问难，我就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特点和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的过程说明了上层和中下层分化的成因，并指出：社会生活是复杂的，由于某些缘故或特点的社会关系的影响，一定阶级或阶层中若干成员的好恶和政治态度，同他所属阶级或阶层的动态和向背很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肯定立宪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

表，是指它的主张、纲领或章程、宣言之类，以及它的成员所进行的活动，确属体现了整个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意愿、要求及其所要实现的任务，而不是以若干上层人士对立宪所持的态度作为依据。至于革命派，也是以它的主张、纲领或是章程、宣言之类，以及它的成员所进行的活动，体现了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意愿、要求及其所要实现的任务，故认定它为中下层的政治代表。众所周知，参加革命必然要冒丧失性命，株连亲族，籍没财产的风险，所以，不但资本家，即使薄有资财的中小商人，听说革命一般也都会掩耳疾走的。事实上，清末的革命党人里，具资本家身分或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人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新式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志士，怀着拯救祖国，造福同胞的宏愿而投身革命的。他们压根儿不曾存心或意识到从事革命斗争是为资产阶级谋利益，只是被时代的潮流推涌到前沿，去肩负变封建制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只是就革命的性质而言定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不是指参与革命的人们是资产阶级分子。确切地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大多数是20世纪初中国新型知识分子中的爱国志士，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时代的先进，民族的脊梁。他们理应受到我们由衷的崇敬。把他们同资产阶级分子等同起来，将使他们的辉煌业绩黯然失色。这种误解，史学界同志理应加以澄清。

四

创立同盟会，领导辛亥革命，是孙中山的丰功伟绩。辛亥革命的全过程同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有密切的关联。故对孙中山事功和思想的研究，除“文革”十年外，可说是历久而不衰。

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的思想（或称孙中山早期思想）如何？

学术界曾有过较大分歧。一部分学者认为，孙中山从目击中法战争的事变起，即立定反清革命的意旨，通过多次的斗争实践，其革命思想逐步明确和完善。主要依据是：孙中山在《有志竟成》那篇自述里提到：“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创建民国之志。”又称：在香港读书时，他和陈少白、尤烈、杨鹤龄等四人“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故被亲友呼为“四大寇”。另一部分学者则觉得，孙中山自1896年11月《复翟理斯函》起，写过或对人谈过自身履历多次，前后牴牾舛凿者甚多，不少记述同他本人经历明显地不符。这可能是执笔撰写或对人谈话时，年湮月久，信手写来难免记忆差误；或由于从事革命活动的需要，有意虚构渲染。至于别人回忆文字，也难免有溢美失实之处。而最足以坐实孙中山在建立兴中会以前思想的材料，莫过于孙自己撰写，由郑观应收入《盛世危言》中的《农功》篇，以及经郑观应、王韬酌加修改的《上李傅相书》（载1894年秋《万国公报》第六十九册、七十册）。这两份见诸载籍的文字，说明孙中山那一阶段还是一位接受维新主张的改良派人士，或者说维新改良主张在他的思想里还占主导地位。从而认为，1894年11月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前，孙中山还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服膺维新变法的改良派人士。

我同意后一种说法。但近年来经仔细考察，又认为即使在创立兴中会时，孙中山仍不曾越出变法改良的樊篱；初创的兴中会，并不是革命团体。因为，据传在兴中会创立伊始即提出来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是不能置信的。我在《论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指出：首先，据传兴中会成立时即提出来的那一誓词，最早见于1929年刊行的《檀山华侨》上邓想所写《中国国民党茂宜支部史略》。在此前后，孙中山及其他亲身参与创立檀香山兴中会的宋居仁、郑照、钟工宇等，专门纪述兴中会史事的陈少白、冯

自由等，在他们各自撰写或他人代笔的文词里都不曾提到这一誓词，冯自由直至1946年出版《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续编》，才依据邓想的文章将誓词补入。邓想非创建时入会者，道听耳食，又系孤证，岂足征信？其次，孙中山曾提到，他于上书李鸿章被拒前往檀香山时，当地华侨“风气未开，人心锢塞”，足见当时檀香山并不具备首倡反清革命，创建共和的条件。如果对1894年11月24日入会的二十二人加以考察，他们入会前的政治态度，概不了解；入会后返国参加反清起义的，只有四人，其余均碌碌无闻；成立会上被推为主席的刘祥，随后竟“无所表现”。1899年，梁启超到达檀香山发展保皇会，只凭“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一面之词，就将那里兴中会员扫数拉进了保皇会。这都说明，兴中会开成立会时，与会者根本缺乏理解、接受这一誓词的思想基础；如果当时的与会者确曾严肃郑重地盟誓信守“驱除鞑虏”的誓词，梁启超怎能凭那囫圇含混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八个字，就都把他们拉进了保皇党呢？再次，1895年兴中会准备发动广州起义时，香港报纸透露起义者的意图称：“就国家而言，没有提出要建立一个共和国。正如改革党提出的那样，中央政府应包括皇帝和三位主要的国务大臣。”这同誓词的宗旨是大相径庭的。故所谓檀香山兴中会的誓词，显系后人传闻误论，并非事实。

1895年1月，孙中山返抵香港。翌月，建立香港兴中会，并旋即议定发动起义。距离檀香山兴中会创立约三个月，是什么原因导致孙中山由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为宗旨，迅即转向反清起义呢？我经过考查，认为这首先与杨衢云为首的辅仁文社部分成员加入兴中会有关。同时，以何启为代表的香港高层华人社会的支持，三合会首领郑士良、丘四、朱贵全的入会，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海陆军败绩所引起的人心浮动，社会机阻的动恣，则被孙中山等认为是发难的良好时机。所以，这次起义准备很仓促，有一定的冒

险性；且因迁就何启等的意向，香港的报纸透露了起义后仍将建立由皇帝和国务大臣组成的中央政府。故乙未起义只是反清革命，民主革命的成份还较微弱。

乙未起义流产后，孙中山逃亡海外，逐渐地明确“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但由于19世纪末中国还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从事民主革命的中坚力量——受资本主义文化思想濡染和教育的先进知识分子群，故1900年兴中会发动第二次起义，仍没有越出1895年起义的格局，起义所提出来的纲领，仍是何启授意，由陈少白拟订的“平治章程”——一份以建立君主立宪为宗旨的方案。转入20世纪，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形成，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产生，其中，先进部分则以戊戌变法的失败为殷鉴，争相走向反清民主革命的征途。孙中山感到，在他的周围，志同道合的人们多起来了；先进的人们也认识了孙中山，咸以反清革命的领袖相期许。孙中山的民主共和信念趋向坚实；因周历世界各国，民主革命思想也渐次初具体系，他也觉察兴中会的章程、宗旨和各地组织机构，两度反清起义所露布的纲领，都已不适合时势的要求，于是决计舍弃兴中会，建立新的革命团体。1903年冬，他重至檀香山，创立中华革命军，提出“驱除建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词。1905年秋再至日本，同云集东瀛的革命者会合，建立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确立了中华民国的奋斗目标。

经历了近十年的反清斗争实践，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思想体系得以形成。

五

关于同盟会，按冯自由的说法是“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而长期较一致的传统说法，则认为同盟会系兴中会、华兴会、光

复会三个革命团体联合组成。近年来，少数学者经过考查，认为上述说法应予否定。我也有同感。

据冯自由称，孙中山“于庚子九月至乙巳秋，结识留学界志士及热心华侨无数，多未使之加入兴中会”。（见《革命逸史》第4集《兴中会组织史》）1903年冬他重至檀香山，创立中华革命军，实际上已舍弃兴中会。1905年7月30日参加同盟会筹备会的兴中会员，按冯自由记载，计有孙中山、梁慕光、胡毅生、黎勇锡和他本人共五人。但实际上，胡、黎二人于1903年冬入东京青山军事学校，孙中山并未使之加入兴中会，实仅三人。故所谓“兴中会改组同盟会”之说，远非事实。

当日到会的光复会会员，仅蒋尊簋一人；华兴会虽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胡瑛、刘道一、张继等六人，乃是前一日设定以“个人自由”参加的，并非华兴会推派的代表。总计兴中、华兴、光复三会参加同盟会筹备会者只十人，占到会人数七分之一弱。迄今还没有发现任何资料可以证实，同盟会是兴中、华兴、光复三方经过事先协商，各派代表集会建立起来的。故所谓三团体联合组成同盟会之说，亦不能成立。

确切地说，同盟会是汇聚于日本的中国革命志士，风云际会，因志同道合，报国心切而集结起来的民主革命团体。

对同盟会探讨较多的，是它的阶级构成和性质问题。史学界多数认为，同盟会是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三民主义者）和资产阶级自由派（二民主义者）以及地主阶级反满派（一民主义者）组成的松懈的联盟。形成这种看法的依据，是将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兴中会目为三民主义者；黄兴、宋教仁等为首的华兴会目为二民主义者；章太炎等组成的光复会目为一民主义者。而经过近年史学界考察，觉得黄兴、宋教仁并非二民主义者，光复会和章太炎，不属地主阶级反满派。而且，如同前面提到，同盟会并非兴中、华兴、光复三团体联合组成；这三团体的成员在同盟